

2013年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福斯特生态学 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

胡 莹◎著

014035891

2013年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

A811.693
16

福斯特生态学 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

胡 莹◎著



北航

C1723288

A811.693
16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 / 胡莹著.

--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 - 7 - 81129 - 681 - 5

I. ①福… II. ①胡… III. ①马克思主义 - 生态学 - 研究 IV. ①A811.6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4634 号

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

FUSITE SHENGTAI XUE MAKE SI ZHUYI SIXIANG YANJIU

胡 莹 著

责任编辑 张怀宇 林召霞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 1000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02 千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29 - 681 - 5
定 价 3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导论 / 1

第一章 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 / 37

第一节 自然、人与社会的有机统一 / 37

一、马克思生态唯物主义思想溯源 / 38

二、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内在的生态之维 / 48

第二节 生态唯物主义诠释下的自然辩证法 / 54

一、辩证法的“越狱” / 55

二、经典马克思主义之自然辩证法的回归 / 59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自然辩证法的回归 / 66

四、生态自然观的出场 / 69

第二章 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批判 / 76

第一节 新陈代谢断裂理论 / 76

一、自然与社会关系的异化 / 76

二、生态学视域下的理论延伸 / 87

三、马克思生态学思想的中心论域 / 92

四、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后续发展 / 94

第二节 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生态冲突 / 95

一、市场解决生态危机的神话 / 96

二、技术解决生态危机的谎话 / 101

三、资本的无限性与生态的有限性 / 106

第三节 生态革命: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 / 111

一、生态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同源 / 112

二、生态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同旨 / 115

第三章 福斯特生态思想对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
观点的启示 / 119

第一节 福斯特与马克思的生态辩证法 / 121

一、自在自然的优先性 / 122

二、自为自然的优越性 / 126

三、自然的隐性自在与显性自为 / 129

四、生态辩证法视域下的福斯特与马克思 / 132

第二节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福斯特的理论缺憾 / 134

一、社会生态学 / 135

二、社会生态学视域下的马克思异化理论 / 137

三、分工的消除:福斯特与马克思殊途同归 / 144

第四章 福斯特生态思想对理解马克思主义现实 批判的启示 / 148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生态批判的资本逻辑及其归宿 / 149

一、本性的冲突:资本与生态 / 149

二、异化的分工:马克思主义生态批判的归宿 / 157

第二节 社会革命:福斯特与马克思共同的理论
归宿 / 160

一、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社会革命的必然性 / 162

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共产主义的现实性 / 163

第五章 福斯特生态思想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 启示 / 171

第一节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 / 171

一、我国生态文明理念的历史溯源 / 171

二、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的现实建构 / 182

第二节 福斯特与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 186

一、中西方生态运动背景之比较 / 187

二、福斯特生态思想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昭示 / 190

结语 / 193

参考文献 / 201

后记 / 217

导 论

在人类文明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生态危机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峻问题,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担忧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为此,人们开始反思传统的自然观和社会观,反思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面对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人们呼唤生态环境意识的觉醒,渴望生态文化理念的重塑。这就意味着人类要用新的思维方式认识自然,认识人类在自然中的地位,认识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在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形势下,在迫切需要理论阐释的推动下,国内外学者纷纷探寻解决生态环境危机的良策,一时间声势浩大的生态运动得以展开。其中一部分学者将生态主义诉求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相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开启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篇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很早的时候就认为人与自然之间应该建立和谐的关系,告诫人类要谨慎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警示人类要充分考虑到目前自身的活动可能对后世造成的影响。此外,他们率先展开了对资本主义反自然、反人性的批判。他们一直都认为社会异化是自然异化的真正原因,要克服人与自然的异化,就必须克服人与人的异化。无论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早期著作,还是晚期著作,都抨击了由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造成的“文明的阴沟”,尤其抨击了由资本主义制度所导致的工人生活与生产环境的恶化。

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尔、阿多诺、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通过技术理性批判将其思想深化为社会批判理论。之后,威廉·莱斯和阿格尔发展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内部的生态学维度。随着生态运动的迅猛发

展,阿格尔明确提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理论思潮,主要代表人物,除了加拿大的莱斯和阿格尔以外,还有英国的戴维·佩斯,德国的瑞尼尔·格伦德曼,美国的詹姆斯·奥康纳、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以及法国的安德烈·高兹等。本书以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研究主题,同时对其他几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如莱斯、阿格尔和奥康纳的思想加以适当研究。

本书通过梳理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的内在逻辑,呈现出福斯特建构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并突出了该学说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同时,本书通过对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以生态学视角深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的发展方向,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生态运动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生态运动中的独特地位

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生态运动既不同于一般的环境保护主义,也不同于欧洲共产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中,把生态问题视为“第三条道路”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五种两难困境”之一,并把生态环境的改善作为一个核心目标。具体而言,生态运动所研究的不只是生态环境的维护与修复,还“包含着研究自然界中相互联系着的那些过程的特殊网络,并且应用这种研究于我们和自然界之间,以及我们自己之间的相互作用”^①。

1968年在意大利首都罗马成立了国际性民间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该团体针对人类文明发展招致生存困境的全球问题展开研究。在其1972年发表的《增长的极限》的报告中,明确声明人类在全世界关心的五个

^① [美]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石音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58—59页。

重要问题,即加速的工业化、加速的人口增长、广泛的营养不良、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和日益恶化的环境的推动下,在未来的一百年将达到增长的极限。该报告的部分内容虽然有待进一步核实,但却给终日沉浸在机器轰鸣声中的人们敲响了警钟,郑重地提醒人类要反思自身前进的路径与方向,提醒人们要慎重考虑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给人类带来的后果,提醒人们要密切关注自身所面临的严峻的自然生态问题。

虽然罗马俱乐部及其活动本身还构不成生态运动,但其唤醒了生活在生态危机中的人们的生态意识,呼唤生态理念的建构,为生态运动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出现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欧洲,主要针对各国工业发展所造成的生态恶化与环境污染的社会生态保护运动和各种民间生态组织,纷纷登上历史舞台,一场声势浩大的生态运动拉开了帷幕。

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生态运动中的重要力量,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视角与资本的批判逻辑阐释了生态危机,并将人类生态危机的解除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相连,指明了人类消除异化,实现人与自然共同解放,走出生态困境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关于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二者之间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二者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生态社会主义关注现实的实践运动。相对而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更注重理论研究,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所蕴含的生态学说的研究与建构。也有的学者认为二者是同一理论派别的不同发展阶段,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其诞生起,大致经历了三个理论阶段: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生态学。本书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指代不同学者笔下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生态学。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大多数坚持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理论流派都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但也有一些坚持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流派,排斥马克思主义理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同生态运动中的其他流派,如生态中心主义等,既相

互呼应、契合,又相互区别、对立,彼此的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各自的基本主张当中。

(1) 生态中心主义的基本主张

首先,生态中心主义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适用于一切生产方式的等级制权力关系,用非历史的等级概念取代阶级剥削概念。因此,其要求消灭工业社会,主张对社会进行生态改造,但对资本主义却持改良主义态度。其理论批判不触及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认为资本主义有消除全球生态危机的能力。所以,生态中心主义主张在体制内以自由市场、分散化的经济、基层民主来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局部改造。总之,它只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力,不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其次,生态中心主义主张依靠知识分子的环境觉悟去克服生态危机,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革命,主张在保留资本主义的框架内改善和保护人类生存环境。此外,生态中心主义否定一切形式的国家,以建立“生态乌托邦”为自己的政治理想。

再次,生态中心主义彻底否定现代主义。生态中心主义深受以卢梭和尼采等人为代表的欧美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成果及发展方向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从批判现代化破坏生态环境开始,生态中心主义就非理性地批判启蒙理性,否定整个工业文明的发展观和价值观,否定技术、反对生产。生态中心主义迷恋部落生活,崇尚“回到丛林中”去的浪漫主义自然观,主张“生态原教旨主义”,主张社会正义,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因此,生态中心主义有一种原始主义的情结。

最后,生态中心主义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反对人类对自然界进行干预和支配,强调自然界的地位高于一切,提出要以生态中心主义取代人类中心主义,甚至鼓吹自然界具有比人类价值“更深的内在价值”。

(2) 绿色运动的基本主张

首先,绿色运动主张温和的“和平主义运动”,主张通过制定各种环境保护法,“严格控制”资本主义,而不是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绿色运动怀疑生产力的发展,主张放慢经济增长速度,反对集中化、官僚化生产,力主建立

一种小型分散、半自动化半手工生产的“稳态”经济发展模式,提倡民主管理,建立生产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绿色社会。

其次,绿色运动的阶级基础主要是西方所称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较高的收入,他们的价值观明显不同于产业工人,他们相对保守,希望社会稳定,反对暴力革命,追求物质享受,致力于发展人的创造性和独立性,强调公民的参与意识和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因此,绿色运动通常只能代表富裕阶层的意志,正因为该运动的根基不牢,所以屡次遭到批评。

最后,绿色运动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的职责就是为其他物种负责,甚至主张在伦理价值领域为其他物种保留一席之地。因此,绿色运动反对物质主义、工业主义,甚至有反对技术主义的倾向。

(3)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

首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特定生产方式是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为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要求从根本上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彻底否定资本主义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唯生产论”逻辑,力求建立一个生态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没有异化的、实现社会公正的社会主义社会。

其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生态运动与工人运动的结合。生态运动与工人运动的目标是一致的,矛头所向都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危机不可能通过改良的方法来解决,只有通过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最终消除生态危机。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工人阶级的反抗意识就必须觉醒。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反资本主义逻辑,注定了它是“绿色”与“红色”的结合。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标志着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工人运动的文化革命阶段”。

再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新殖民主义的本质的批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发达国家将一些能源消耗大、污染严重的企业迁移到不发达国家,是对不发达国家进行殖民掠夺的继续。发达国家不仅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廉价的原料产地与劳动力市场,而且将其作为倾倒废品的垃圾场。虽然发达

国家表面上也叫嚷着要消除生态危机,但是其为了保护本国的生态环境而不惜破坏他国的生态环境。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性质决定了其最多只能为保护本国或局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做出些许努力,而不可能解决全球的生态危机。同时,这种为一国而伤全球的“伪生态”行为,只会使世界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生态运动视为现代性自身的完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自身“后现代”倾向背后的“现代”根源,坚持自己植根于启蒙主义、现代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发展观与价值观,认定自身具有修复现代性,继续追求文明的能力。此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还要求“对现代性本身加以现代化”。

最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生态危机是由对待自然的资本主义特定生产方式引起的,并非产生于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批判的对象不应是人类中心主义,而应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资本主义特定形式——唯生产论与技术中心主义。然而,无论是人类与自然的和解,还是人类对生态文明的建设,目的都在于使人类能更好地生活,都是“以人的尺度”面向自然与社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信只要以人的合理需求和利益为出发点,就能确定人类对自然改造的合理限度,就能提供估价生态问题的参照系。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反对简单地限制人口与生产发展的做法,指出我们应该反对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而不是反对人类社会的生产力。

综上所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和绿色运动的根本区别在于其对生态危机根源的认定不同。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的特定生产方式,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立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阶级关系和剥削关系是环境恶化的根源,坚决主张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代之以生态和谐、消除异化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而生态中心主义与绿色运动则立足于西方中心主义的生态学,对自然环境问题的分析与批判不涉及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不触及资本主义私有制,主张在保留资本主义的框架内改善生态环境。如果只是将批判停留在人与自然之间的价值冲突领域,那么我们是不能真正解决生态环境

问题的,反而还有可能掩盖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正是在此种意义上,西方生态哲学的弊端使其成为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理论。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因此,唯有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其上的政权结构进行彻底的变革,才能真正完善价值体系、科技体系与生产体系,才能真正恢复自然的尊严、解除生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生态运动的中坚力量,也是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派别。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

马克思的生态批判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在主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如考茨基、列宁和布哈林的著作中,都能看到马克思的生态批判思想。但随着列宁与其他几位马克思主义者的逝世和斯大林主义的盛行,环境保护主义作为“走资化”遭到攻击。更糟的是,随着李森科主义的兴起,“科学”首先攻击了生态学然后又抨击了基因学,到20世纪30年代末,苏联的环境保护运动被彻底摧毁了。从20世纪30年代起,失去生态学维度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思想遭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直到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的出版,欧美地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的生态学维度才随着环境主义的再次兴起而复活。可以确定的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之一的法兰克福学派,开创了一种生态批判的视角。但遗憾的是这种生态批判视角主要集中在哲学领域,尤其是集中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而《资本论》中的生态学思想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诠释。部分学者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特别是马克思的晚年思想,是统治自然的“普罗米修斯主义”,一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学者当中才出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更为复杂全面的理解。此外,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者才开始探究马克思关于土壤养分和有机循环的思想,其中主要强调的是马克思对土壤养分问题的处理。

1. 孕育期:霍克海默尔、阿多诺、哈贝马斯与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立足于实践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反思了导

致人类物化的启蒙理性与科学技术,力求解除技术理性对人类的束缚。在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的技术理性批判思想中,包含着对生态学思想的反思。“作为工业文明的主导性文化精神之一的技术理性主义,直接导源于希腊的古典理性主义,是传统理性主义同文艺复兴的人本精神及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体,它构成理性主义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①“所谓技术理性主义是指在近现代科学技术呈加速度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的理性主义思潮。它立根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无限潜力和无限解决问题的能力之上,其核心是科学技术万能论。”^②技术理性激发人们自身当中的无限潜能,使人以神的姿态在现实的此岸世界建造彼岸的天国。人们借助技术理性夺回让渡给上帝的无限力量,从此,自然不再是神造物,而成为受人类改造、被人类利用的存在物。人类沉醉在这种以功利为目的的改造中,肆无忌惮地支配自然、处置自然,以使其满足人类的无限需求。

技术理性将人变成了中世纪的上帝,人只要拥有技术就拥有了解决一切的力量。技术理性就是一切,无须情感、无须信念、无须一切非理性,从此,人变成了机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机器。所以,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以对技术理性的批判为途径,探求人性的复归之路。人不能没有理性,也不能仅有理性!理性可以使人拥有无限的力量,但是人更要有形而上的追求,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形而上的追求才使人脱离了动物界而高于其他生物,成为真正的人。

然而,技术理性在使人类日渐强大的同时,也使人逐渐物化。不知从何时起,仍然沉醉在战胜自然的喜悦当中的人们,早已沦为技术的奴仆。因此,在庆祝人类战胜自然的锣鼓声还未平息时,有些人就已经吹响了向技术理性宣战的号角。霍克海默尔、阿多诺,以及后来的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以“启蒙辩证法”、“否定辩证法”、“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和“单向度的人”等,纷纷投入到这场战斗当中,斗争的矛头指向了科技异化。

① 衣俊卿:《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4页。

② 衣俊卿:《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5页。

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意识到“权力与知识是同义词”，指出人们通过理性的发挥不但能够明确自然、把握自然，而且可以利用自然、控制自然。“人们从自然中想学到的就是如何利用自然，以便全面地统治自然和他者。这就是其唯一的目的。”^①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从自然界中脱颖而出，并开始了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然而，人类的解放并不必然带来进步，还有可能使人类遭受新的压迫。“技术合理性已经变成了支配合理性本身，具有了社会异化于自身的强制本性。”^②科学技术在使人类成为统治者的同时，也使人类成为被统治者，使人同其母体——自然异化。人类在向自然索取的同时，也遭受着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人对自然界（人类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统治的代价是劳动在社会上和心灵上的划分，这种分工使人类受到越来越大的压迫，甚至当它在为人类的解放创造日益增长的潜力时也是如此……所以，虽然启蒙精神的理性主义提高了人统治自然的力量，但和这种作为罪恶之源的劳动分工一起的，是人同自然的异化。”^③科学技术的异化导致人和自然受奴役，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异化。

关于科学技术，哈贝马斯批判道：科学技术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了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马尔库塞也指出，技术理性已上升为意识形态。人类想要征服自然界的欲望和对自然界的敌视态度，遮蔽了人类智慧的双眼，使人类忽视了自然界的资源与承载力的有限性，遗忘了人类对自然界的这种无限的掠夺会遭到自然界的惩罚。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使人对自然的控制必然联结着人对他人的统治，而这种统治和控制最终会走向剥削和掠夺，走向异化。“技术是知识的本质，它的目的不再是概念和图景，也不是偶然

① [德] 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 页。

② [德] 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08 页。

③ 转引自邓志伟：《法兰克福学派生态危机论探析》，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 年第 3 期。

的认识,而是方法,对他人劳动的剥削以及资本。”^①此时法兰克福学派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科学技术,认为科技异化是生态危机的根源。

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的主要代表人物,在继承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的关系,对现代社会的技术理性进行了更加深刻的剖析和批判。哈贝马斯对现代技术理性做出深刻批判的同时,并不否认科学技术对现代社会发展所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随着大规模的工业研究,科学、技术及其运用结成了一个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工业研究是同国家委托的研究任务联系在一起的,而国家委托的任务首先促进了军事领域的科技的进步。科学情报资料从军事领域流回到民用商品生产部门。于是,技术和科学便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②正是因为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所以科学技术也被赋予了更多的特权。即使科学技术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额外的压抑,人们也自愿地而不是被迫地接受它。“马尔库塞认为,‘在个人愈来愈严重地屈从于巨大的生产设备和分配设置的情况中,在个人的业余时间不为个人所占有的情况中,在建设性的和破坏性的社会劳动几乎难以分辨地融合在一起的情况中’,人们可以看到客观上多余的压制。但是,这种压制又可以自相矛盾地从人民群众的意识中消失,因为统治的合法性具有一种新的性质,即‘日益增长的生产率和对自然的控制,也可以使个人的生活愈加安逸和舒适’。”^③也就是说,人们更看重科技对这种额外压抑的补偿。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满足了人们更多、更高的需求,使人们的生活更加舒适安逸。因此,人们是不会也无法抛弃先进的科学技术的。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成为社会成员和统治阶层的唯一目标。因此,政治的合法性取决于经济的合理性,而经济的合理性则有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

① [德] 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 页。

②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2 页。

③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0 页。